

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与实践

李斌

作者赐稿

-

梳理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时就会发现，南京与现代戏剧教育发展关系密切，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重镇，而陈瘦竹先生正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在他之前，两代戏剧教育家不懈努力；在他之后，学识深厚的中青年学奋战于戏剧教育战线。第一代现代戏剧教育家以吴梅先生（1884—1939）为代表，南大的前身金陵大学正是他从教之所，南京也因而成为他从事戏剧教育的主要地方。第二代现代戏剧教育家以余上沅先生（1897—1970）为代表，作为南京重要戏剧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的校长，他广纳贤才、兼容并蓄，先后聘请了应云卫、陈治策、曹禺、马彦祥、王家齐等人为专任导师。后该校迁于四川江安，陈瘦竹先生即于此地被邀入校的，也正是在余上沅先生的赏识和扶持下，陈瘦竹先生走上戏剧教育的大舞台。第三代现代戏剧教育家便是以陈瘦竹先生（1909—1990）为代表，他继承与发展了前辈戏剧教育家的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教育精神，又是新中国第一代戏剧教育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剧教育家的杰出代表。

—

用陈瘦竹先生自己的话说，他走上戏剧教育生涯，源于他“偶然”来到四川江安。但我们认为也有必然。陈瘦竹先生少年时就受过师范教育，1924年考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虽然以后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但毕竟打下师范教育的根底。读师范期间，陈瘦竹古文基础扎实，同时在文学上崭露头角。毕业前，陈瘦竹观看了田汉的《南归》，这是他第一次观看新话剧。戏剧与教育的融合，已初步在陈瘦竹身上显现。陈瘦竹最终走上戏剧教育的道路，受到一些优秀的教师的影响。陈源老师便是其一。1929年，初入武汉大学的陈

瘦竹，非常佩服文学院院长陈源，在陈瘦竹《春雷·再版前记》中曾详细记载了陈源讲课的风采。我们认为，陈源的一些教学方法，不少都成为陈瘦竹日后的教学的模板，如“指定学生读原文，然后口译”，突出学生主体性，“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回答”，强调创新性思考等。陈瘦竹先生自称的在大学接受的“一点严格训练”，日后都成为他对学生们的基本要求。同时，陈源大力推荐陈瘦竹的短篇小说《巨石》给上海的《申报月刊》发表，这种悉心关注学生学术成长的师长气派极大影响了陈瘦竹，使他后来一直以扶掖年轻人为己任。也正是在陈源的课上，陈瘦竹先生接触到了易卜生的著名剧作《社会支柱》和《野鸭》。陈瘦竹先生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到1940年，都在从事编译与文学工作，成为知名的乡土小说作家。他虽然没有直接走上戏剧教育岗位，但他仍然在国立编译馆期间接触并初步研究了西方优秀的戏剧及相关理论作品。戏剧就像神秘美丽的岛屿，一直在陈瘦竹先生前半段学术生涯里隐显不息。

“江安教育”，成为陈瘦竹戏剧教育的起点。1935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南京成立，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戏剧专科学校。后迁往江安。陈瘦竹的妻子沈蔚德先生进入剧专继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编剧、戏剧理论、表演基本训练。沈蔚德先生成为陈瘦竹先生走上戏剧教育战线的先导。余上沅先生正是通过沈蔚德先生邀请陈瘦竹先生加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陈瘦竹先生在江安这块宁静美丽的土地上，触摸到了戏剧教育美丽的面纱。1940年10月，陈瘦竹先生正式执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主讲剧本选读、西洋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等课，开始长达四十多年的戏剧教育生涯。国立剧专作为中国当时的戏剧最高学府，云集了众多名师，如先后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及各科、部主任的有应云卫、陈治策、曹禺、应尚能、杨村彬等，来校任教和讲学的教师有田汉、马彦祥、宗白华、吴梅、赵元任、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陈白尘、叶圣陶、焦菊隐等。陈瘦竹夫妇是他们中的一员。浸润在这个话剧艺术的百花园中，陈瘦竹先生严格要求，认真备课，一心把文学与戏剧才华奉献给戏剧教育。为了讲好每一堂课，揣摩戏剧艺术的细节，陈瘦竹与沈蔚德先生要反复商量与推敲，有时甚至要发生争吵。

任教期间，陈瘦竹先生研究与教育并行，展示出他视野开阔、贯通中西、注重艺术感悟力的教育风格。1942年，陈瘦竹先生接替曹禺的“戏剧批评”课

程，他以欧洲自亚里斯多德以来最有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聂考尔的《戏剧理论》及聂考尔依据的H·B·克拉克编译的《欧洲戏剧理论文选》作为主要教材，融汇进自己对戏剧艺术的鉴赏感悟，讲授自欧洲亚里斯多德以来至20世纪的戏剧理论。陈瘦竹先生还在翻译介绍西方戏剧思想与戏剧流派上取得突出成就，其中既有欧洲古典戏剧如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也有19世纪“新戏剧”思潮的新浪漫派、象征派、自然主义戏剧。陈瘦竹先生的戏剧学术成果反过来拓展了戏剧教育的深度与广度。比如他主张多元探索戏剧的基本理论问题，“试图超越传统戏剧观念，领略现代戏剧美学真谛”，表现在他讲课上，经常能够就戏剧本质、戏剧类型、戏剧结构、戏剧风范等概念提出新鲜独特、高屋建瓴的美学见解。后来剧专成立了剧场艺术组和理论编剧组，陈瘦竹任理论编剧组组长。这也表示出众人对陈瘦竹先生戏剧教育能力的认同与赞赏。抗战胜利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回南京，陈瘦竹继续在该校任教，1947年，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先生邀请陈瘦竹任教授，讲授小说、戏剧和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等课。

全国解放初，陈瘦竹先生才40岁，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正处于戏剧教育的黄金年龄，与前辈胡小石、方光焘一样深得学生崇敬，并已成为新中国戏剧教育的骨干。陈瘦竹的戏剧教育生涯开始了新阶段：南大教育。陈瘦竹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教育工作者。他的教育生命从此与南京大学中文系紧紧维系。

陈瘦竹先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中西贯通、开放包容学术精神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南京大学中文系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主要创始人张之洞曾说：“考学校者当考其规制之所存，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贯，规制亦徒存耳。”陈瘦竹身上就体现出这种“貌似保守，实为开放，貌似复古，实为革新”的南大中文系精神。他从事戏剧教育的过程中，并不局限在中国戏曲研究上面，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从40年代西方戏剧理论到50年代研究中国现代话剧创作，陈瘦竹先生一一关注并论评，力图建造中国式戏剧理论真善美的殿堂，搭起中西戏剧理论的宏伟的桥梁，极大开拓了戏剧教育的视野。同时，陈瘦竹先生特立独行、不逐时尚的人格魅力与学术操守也成为南大中文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磨秃的钢笔”、“磨得闪闪发光的高倍放大镜”已成为陈瘦竹先

生坚定毅力与执著精神的符号化表征，激励着一代代南大莘莘学子。陈瘦竹先生治学讲究实事求是，绝不迷信权威，敢于对所谓经典型的“定论”发起挑战，如他客观分析亚理士多德“悲剧作用”理论、批驳黑格尔的悲剧观念等等。这种学者式的严谨、对艺术科学严肃、审慎的态度、理论家的独立品格与坚毅正直的人格勇气是陈瘦竹先生对南大中文系精神史的重要贡献，已成为南大中文系精神史的一部分。

建国后，陈瘦竹先生参与建设南京大学中文系，使之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院系。他对南大中文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上。他在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在当时具有开创意义，他自成一体的戏剧理论为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现代戏剧学学科做出了出色贡献。莫砺锋教授在2004年中文系建系90周年上讲话称：“90年来，像国内所有的大学以及相关系科一样，南大中文系始终伴随着整个国家的风雨历程，先后经历了抗战西迁、院系调整以及‘文革’等曲折过程，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这其中，陈瘦竹先生有一份不能忽视的重要功劳。

二

陈瘦竹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早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期间，他就参与培养了众多戏剧人才。后进入南大任教，培养与扶植大量人才。如1978年秋，全国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首届录取的四位汪应果、朱栋霖、王文英、任天石，在陈瘦竹、叶子铭指导下，完成巴金、曹禺、夏衍、叶圣陶的研究专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些人才当下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戏剧界与教育界的抗鼎之人。稍举几人即可。朱栋霖，陈瘦竹先生所带1978级第一批硕士生，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朱寿桐，陈瘦竹先生所带1983级硕士生，现为暨南大学教授，担任过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周安华，陈瘦竹先生所带1983级硕士生，现已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戏剧戏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赵康太，陈瘦竹先生所带1986级博士生，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理事，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和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阎广林，陈瘦竹先生所

带 1987 级博士生，现已是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陈瘦竹先生的学生遍布全国，他们既撑托起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研究与教育的大厦，同时又把南大中文系的学术精神带向全国。在他们身后，是陈瘦竹先生睿智和慈祥的目光。

几乎所有听过陈瘦竹先生讲课的学生都被他那一流的讲课艺术折服了。陈瘦竹先生视力不好，但是学识广博，讲课不用讲稿，记忆力惊人，讲完课后“记录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我们来看几个学生的回忆。孙家说：“他教课认真，对待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他总是以充实的讲授内容和正确的教学方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田本相也说：“不少听过他讲课的中青年学者或学生告诉我，说陈老讲课向来不看讲稿，丝毫没有‘背书’的生硬气，而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非常自然生动。这就可以想见他平时读书用功之勤奋，积累之丰富，才能在讲学和讲演中，收到如此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的效果。这是他的独特的本领，也是他的一种独创的艺术。”杨有业说：

“陈瘦竹先生的课讲的好。不仅内容深刻，而且讲授方式也灵活自如。只见他一把纸扇，一杯茶水而已，上得台来，滔滔不绝，声音洪亮。一会儿板书，字大如球，英文板书畅达优美一会儿大段大段地背诵曹禺剧作，十分流利。不仅没有讲稿，就连卡片也不带一张大有说评书的架势，正是这一点，学员都被他吸引住了，大会场鸦雀无声，更无一人走动。要知道，学员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讲师、副教授，听课竟能如此，说明讲授者具有何等的魅力，那是不言而喻的。”杨有业还回忆说：“在南京大学访问期间，我听了陈先生专给他的几名研究生讲的《名剧选读》课一学期，每周一次，一次半天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师生数人团团围坐。陈先生仍然是一把扇子、一杯茶水。请看当年我听课笔记《后记》中的一段话“听陈先生课，真是享受也老先生七十六高龄了，讲课自带一茶杯而已，连个提纲都没有。人名、作者、生卒年月，外文字母以及剧中人物大段对白，凭口而出，真是少见的惊人的记忆。”这种风采令我辈无缘聆听陈瘦竹先生讲课的学生来言，真是高山仰止，心存景仰。

陈瘦竹先生的戏剧教育课堂并不是在教室，而是在社会。所有来向他请教戏剧、求教学术的学人们，都是他的学生，他都用热心、真心与爱心对待，不

论对方身份、地位与年龄。田本相就回忆道，在他初入戏剧研究殿堂之际，撰写了《曹禺剧作论》，他把开初几章寄出向陈瘦竹先生求教，“那时我不知道先生眼疾甚重，已经不能过多阅读。很快，就有了回音。他让正在做他的研究先生的朱栋霖同志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其中除鼓励外，还提了许多宝贵的具体意见。从信中才得知先生是听学生读我的稿子，然后提出意见嘱栋霖写的。这使我十分感动，也深深感到一位前辈对一个陌生的求教者的无私的爱护和支持。朱暄也回忆在南大求学时，陈瘦竹先生连夜修改朱暄写的现代戏《汉府新村》，陈瘦竹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后很少动笔写戏，他为了学生“青胜于蓝”，“破例下海”，让作者记忆一生、感动一生。

戏剧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是陈瘦竹先生戏剧教育重要特点。他不是单纯的教书匠，而是注重把戏剧学术与戏剧教育紧密结合，随时总结教学经验，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并用学术研究的成果，丰富课堂教育的内容。如他把讲授戏剧与研究戏剧结合起来，在开设田汉戏剧、曹禺戏剧课程后，论文或专著《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论田汉的话剧创作》也随之发表或出版。陈瘦竹先生善于把做学问的研究方法融入课堂讲授之中，如他讲授戏剧课程多用作品比较、中外对比的方法，如把巴金的小说《家》与曹禺就此改编的话剧《家》对比，穿插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与他自己改编的话剧《茶花女》的对比，把中国剧作家丁西林的喜剧与英国剧作家芭蓄的名剧《十二英镑的神情》对比，把曹禺与契诃夫对比，进而让研究生们站在中西比较的高度审视中国戏剧。这都是陈瘦竹先生对戏剧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授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从事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陈瘦竹指导学生过程中尤重介绍研究方法，他认为好的研究方法应是“历史与美学观点相结合”，陈瘦竹先生的《法国浪漫运动与雨果欧那尼》、《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和他的喜剧》、《再论郭沫若历史剧》、《郭沫若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关于曹禺剧作研究的若干问题》等，都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的力作。陈瘦竹先生主张将作家同其作品放在当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从相似或相异的作品比较研究中，发现作家所接受和所产生的影响、成效得失及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除了比较研究外，陈瘦竹传授给学生的治学经验核心是“艺术分析”，“陈瘦竹擅长的戏剧本体艺术分析也得益于艺术理

论”，即关注文学中生动的情感的部分，强调艺术分析、细致分析创作过程、结构方式、遣词造句以及语言的色彩和音律，充分揭示其美学特征，正如陈瘦竹先生自己所说：“研究文学必须培养艺术敏感。对于作品，我们不忙先作理性分析，而先加以直觉感受，像作家那样去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随着感情的波动，痛苦时就哭，高兴时就笑。先做欣赏者，再做评论者。”这种源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艺术分析的观念也通过陈瘦竹先生的戏剧教育，播撒到学生们的学术生命之中。2009年，朱栋霖先生参与改编中篇评弹《雷雨》，提升了繁漪在《雷雨》中的情感地位，突出了“情感”在《雷雨》中的新地位，延续了陈瘦竹先生的教育理念，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朱栋霖先生指导我从事昆曲研究时，也非常强调对作品的艺术感悟，他反复强调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诗，“艺术是要表现心灵的体验与发现，又要令人有心灵的回味的。这样的艺术达到了诗的境界。充盈的诗意，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要……电视片本身也进行了一次诗的创作，形成了充满诗意的叙述。”这种思想是受到陈瘦竹先生影响的。

陈瘦竹先生指导博士生的立人治学十六字原则为“基础深厚，学风朴实，奋发图强，坚持原则。”他对学生的学术指导可谓尽心尽力。从朱栋霖先生的回忆可见一斑，1980年，他在陈瘦竹先生指导下，撰写关于曹禺戏剧的硕士论文，1980年6月开始到1981年6月的一年间，陈瘦竹先生用了很大精力参与论题的构建、论文的修改，“（1980年）六月二十三日他派人送来一张便条，那是他用毛笔书写的‘《日出》论文进展如何盼于明日或后日上午八时半来寓一谈’”，“二十五日上午我带着一个详细提纲向陈先生汇报”，“七月十五日我带着《日出》的论文初稿去先生寓所”，“十一月六日下午，我在南大校园物理楼前遇见陈先生，两人就在雪松下石凳上坐着谈这个问题”，“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向陈先生读了《论原野》的初稿”，“（1981年）一月十二日、三月十七日、四月初，陈先生同我三次讨论《雷雨》”，“三月二十二日陈先生给我谈曹禺的悲剧”，“四月十一日我向陈先生汇报关于曹禺戏剧的历史贡献的思考”，“六月二十五日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我继续完成曹禺其他剧作的研究”，“十二月四日，我完成了《曹禺戏剧与契诃夫》一文，陈先生听完我朗读全文，表示很满意。”陈瘦竹先生在指导学生论文过程中其体现

出来的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视力只有 0.04、只能依靠学生朗读来指导论文的七旬老者。对此，沈蔚德先生有回忆：“你视力极差，在指导他们所写论文时，只能以耳代目，听他们自己朗诵其中内容。一天，夜已深了，从书房里又传出这种朗读的声音。……等我赶到书房一看，不见来人影踪，只见书桌上摆着一台录音机，上面小红灯闪闪发光，声音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我不禁一怔，再一看，你坐在沙发里，轻闭双眼，皱着眉头，歪着身子，用手紧压着右胸，明明是忍受着剧痛在倾听。……我不忍去阻止你。我知道只要你一息尚存，就会为培养人才而付出最后的精力的。”

陈瘦竹先生非常注重教学形式的灵活，注重发掘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启迪创新思考能力。他在课上经常发动讨论，杨有业就回忆道：“师生一起讨论，从不强加于人。陈先生在课前布置作业，下次讲什么，让研究生看什么书。在下次课上，先由一个个研究生讲，然后，再由陈先生给以总结，先表扬每个学生的独到之见，再指出不足之处，最后谈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出生晚矣，无缘当面聆听陈瘦竹先生授课，但我的导师朱栋霖先生正是他的高徒。朱栋霖先生指导我从事戏剧影视方向的博士研究时，就强调集体讨论，我们经常三五个博士生，去老师家上课，大家就一个话题共同讨论，然后彼此提出意见，共同进步，师兄曾经回忆这样的日子：“一边赏月白风清，一边品艺术人生话题，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于谈吐朗笑声中，不觉已融入自然化境。感觉思如泉涌，疾若奔电，竟不复有加了。”在讨论中加深对研究主题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反复雕琢、细至毫微，并亲身示范，令学生养成敢于创新思考、脚踏实地学术研究的习惯，“以科学的态度，对作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正是陈瘦竹先生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三

陈瘦竹的戏剧教育生涯中，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他心中的真情与爱。这份爱中既有对祖国的爱，也有对戏剧学术的爱，它们都凝聚与表现有对青年学生和晚辈学人的爱上。正如有评论认为：“瘦竹同志是一位最佳教师的代表者，他和青年学子们教学相长，共同战斗。五十余年来他哺育了众多得力的戏剧人才；在他的心中只有理想、爱和责任感。”

陈瘦竹先生与学生的关系既是师生，又同父子，既有学术上的悉心教导，更有生活上的细心关照。1949年4月1日，南京学生为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和平条件而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多人受伤，陈瘦竹先生不顾个人安危，赶往营救遭到拘留。对此，沈蔚德先生有着深情的回忆：“你心急如焚，不顾自身安危，立即要去探望。……可是，从天黑到深夜直到拂晓，还不见你回来。我在屋里彻夜未眠，坐立不安，……我仿佛觉得这一夜等于经过了一个世纪，自己也老了许多。……好不容易煎熬到快天亮时，想不到你居然经过一夜的拘留和审讯，带着一脸的憔悴和疲惫，从卫戍司令部脱险归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你我共同度过的这惊涛骇浪似的一夜，又是多么令人永世难忘啊。”陈瘦竹先生为了学生不惜置自己安危于度外，这不正体现了他对学生的爱吗？

但是这种爱是讲原则的，对于学生的错误，尤其是对待学术的不严谨，陈瘦竹先生一贯是严厉批评的。杨有业曾经回忆道，陈瘦竹先生参加 让他的位研究生作为特殊代表参加中国首次莎士比亚戏剧节，观摩戏剧。结果返校后，学生们并没有完成观摩任务，陈瘦竹先生大光其火，取消了学生旅费、宿费及观摩费的报销，当然，这笔钱一半是陈先生出的。这也反映出陈瘦竹先生在戏剧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对戏剧学术的认真态度与实事求是精神。

居里夫人曾说过：“如果能追随理想而生活，本着自由的精神、勇往直前的毅力、诚实不自欺的思想而行，则定能臻于至美至善的境地。”陈瘦竹先生正是这样：追求正义、秉持理想。早在20年代陈瘦竹先生尚在无锡师范时，校方斥责一位写新诗的学生，陈瘦竹给予驳斥，他愤而退学。尽管毕业文凭即将到手，但他不愿背弃内心的正直与良知，这既体现了他“侠骨傲然的性格”，又展示了他追求新文学的理想。陈瘦竹先生把个人的性格品性、精神追求、理想构建与戏剧教育事业融而为一，使得他的每次讲课带给学生的，除了学术上的震撼，更有精神上的熏陶。仅举一例。周勋初是1950年考入南大中文系，成为陈瘦竹的学生，后来他在“文革”中长期被放逐农场，还曾受到批判，但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勤奋工作，独立思考，先后完成《九歌新考》（1960）、《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66）、《高适年谱》（1973）、《韩非子札记》（1974），以及《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赋〉写作年代新探》

等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完成于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但都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例如，对于《韩非子札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长尾龙一曾说：“我发现了研究韩非子的具有敏锐智慧和渊博知识的内地学者周勋初的著作，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居然有这样的智慧幸存下来，这使我深受感动。”当被问及为什么能够在那种岁月中保持清醒的理性，不断地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呢？周勋初先生回答：师承和学术传统起了关键的作用。胡小石、罗根泽、方光焘、陈瘦竹等中文系教师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晚年，陈瘦竹先生视网膜黄斑加重，视力只有0.04，他用双倍放大镜阅读外文原著，完成了三部学术著作：《现代剧作家散论》（1979）、《论悲剧与喜剧》（1983）、《戏剧论文集》（1988），一百余万言。田本相同志在《陈瘦竹戏剧理论研讨会开幕词》中就感叹说，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坚定、执著和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戏剧文化事业的先辈们都值得我们尊敬，“而像陈瘦竹先生以这种执著、坚定和无私的情怀献身于戏剧理论研究，并在这荒漠的领域中踽踽独步，苦心孤诣，奋力前行的却无二例。”这份追求理想、矢志不移的人格魅力是陈瘦竹先生留给学生的最大的精神财富。

沈蔚德先生对陈瘦竹先生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治学严谨，执着地追求正义和真理，为开拓戏剧美学作了种种探索。”我们认为，陈瘦竹先生同样在戏剧教育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没有像吴梅、余上沅先生那样做出奠基性、开创性的事业，但是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充满关爱以及高尚人格的教育，都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并以活的精神，永远承传延续下去。